

# 經典的形成、 流傳與詮釋

第一冊

主編：林慶彰、蔣秋華  
編輯：張穩蘋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經典與文化的形成」研究計畫先期規畫成果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CSJ  
2012/10  
1

#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

## 第一冊

林慶彰 主編  
 蔣秋華  
 張穩蘋 編輯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一）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7[民 96]

冊；公分

ISBN 978-957-15-1386-7(第 1 冊：精裝)

1. 經學 2. 研究考訂 3. 文集

090.7

96023341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一冊）

主 編：林 慶 彰 、 蔣 秋 華

編 輯：張 穩 蘋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盧 保 宏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話：(02)23634156

傳真：(02)23636334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  
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02)22268853

定價：精裝新臺幣九六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七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09071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386-7(精裝)

#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

## 序 言

林慶彰

中國所謂「經典」，是指儒家的《十三經》。《十三經》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等十三種。所以能成為經典，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聖人及門弟子的著作，或經聖人刪定。二是經當時政府認可，立於學官。所以，所謂「經典」，是聖人集團的製作、編訂，加上官學化的結果。

被列入經典的著作，由於官方的支持，傳習者多，流傳也廣，所以這十三部經典，歷來為它們作注疏或研究，多者數千種，少者也有百種。但是，古代的著作不僅這十三種而已，性質和《尚書》相近的有《逸周書》，和《左氏傳》相近的有《國語》、《戰國策》，和《論語》、《孟子》性質相近的有《墨子》、《老子》、《莊子》、《荀子》、《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所謂先秦諸子。上述這些著作，由於未能列入經典，歷代傳習者少，有些幾乎亡佚。

二〇〇三年，中央研究院為提振中國古典研究，委由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及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共同籌畫「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研究計畫。計畫下分為「經典與文化的形成」與「古代中國及其周邊」兩項先期計畫，進行先期研究及規畫事宜。期望藉此結合國內外相關學門之研究者，共同組成研究群，以新方法、新觀點、以漸進方式推動中國上古史相關主題之研究及人才培育，期在國際學術界中建立臺灣在此研究領域之領銜地位。其中，中國文哲研究所所負責的「經典與文化的形成」計畫，在為期兩年半先期規畫計畫的執行期間，大抵著力於三大主題，一是經典的形成與流傳；二是經典的詮釋；三是經典所反映的文化面相。茲分別敘述如下：

## 一、經典的形成與流傳

中國今存最早的文獻資料，應是《周易》、《尚書》、《詩經》，接著是《春秋》、《儀禮》等。這些著作，到戰國時逐漸被稱為經，也有許多解說經的注解性文獻出現，如解說《周易》的有《易傳》、解說《尚書》的有《書序》，解說《詩經》的有《詩序》、《毛詩詁訓傳》，解說《儀禮》的有各種傳、說、記，解說《春秋》的有《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等。這些傳、序、說、記本來只是解經的文字，後來地位漸高，逐漸變成經，甚至凌駕原來經的地位。既是經典，就有其權威性。其權威性格如何形成？一旦權威性格被消解，經典的地位又如何？

近年，由於文獻出土，對當時經典的形成和流傳，也有相當的修正。如《周易》的傳，本來只有《十翼》，但是馬王堆出土的帛

書《周易》材料，有《二三子問》、《易之義》、《要》、《繆和》、《昭力》，都不在《十翼》中，可見《十翼》並不是當時解說《周易》的全部文獻。又如《詩經》有《詩序》，上博楚簡中的《孔子詩論》，性質和《詩序》有點相近，但觀點有相當的出入。可見，《詩序》也不是當時解釋《詩經》的唯一材料。

除出土材料增多，有助於經典形成的研究外，新出土的帛書《周易》、阜陽漢簡《詩經》、《孔子詩論》等，都可見看出經典文字與今本有相當的出入，可見，在先秦漢初流傳的經典，尚未定型化，何時定型化也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進入漢代，從文帝、景帝起，經典開始立於學官，武帝時立有五經博士，宣帝起今文學興起，有所謂章句之學，東漢初今文學家開始引緯書來解經。漢末更以今文學的文本刊刻石經。同時，古文學派開始受到重視。從兩漢經書的流傳過程，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1)官學化的過程，如何影響經書的性格？(2)今文學家用以鞏固其地位的師法與家法，對經書產生甚麼樣的影響？(3)今文家利用緯書來解經的時代背景和意義？(4)刊刻石經如何鞏固經典的地位？

如將先秦思想家的著作也視為經典，則各家著作的形成與流傳，也有可探討的地方。前人或以為《老子》書後於《莊子》，郭店出土竹簡《老子》甲、乙、丙三本，可證明此種說法並不正確。至於諸子思想形成過程中，與《周易》、《尚書》、《詩經》、《春秋》等經典的關係，也值得討論。另外，諸子著作在漢代的流傳情形，鮮有深入論究，這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如把《史記》、《漢書》視為經典，可研究的論題也不少，是什麼的動機和背景讓他們創造出與前代史書不同的體例？他們在寫

作的過程中，所受儒家經典價值觀的影響如何？

前代學者受材料的限制，對經典的形成與流傳，往往因襲成說，近數十年來地下文獻出土，如：武威漢簡、馬王堆帛書、阜陽漢簡、山東臨沂竹簡、郭店竹簡、上博楚簡等，對研究先秦經典的形成與流傳，解決某些疑惑，更糾正不少前人錯誤的觀點。如能充分利用這些出土文獻，對經典的形成與流傳，應有更合理的解釋。

## 二、經典的詮釋

《周易》、《尚書》、《詩經》產生的時代較早，春秋以前人所作的解釋，沒有較具體的文獻留傳下來，解釋的方法和方向如何，不得其詳。從春秋時代起，像《國語》、《左傳》、《論語》、《墨子》等書，對經典都有零星的解釋。戰國以來解釋《周易》的有《易傳》，解釋《尚書》的有《書序》、《尚書大傳》，解釋《詩經》的有《詩序》、《毛詩詁訓傳》，解釋《儀禮》的有各種傳、說、記，解釋《春秋》的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種解釋不但豐富了這些經典的內涵，也塑造經典的性格。

到了漢代，經學立於學官，今文學有師法、家法，在師法、家法規範下的經典，解釋的方法有所謂章句之學。此外，今文學家援引緯書解經，也增強經書的神秘性和神聖性。從春秋戰國到東漢末，經典的解釋者如何重塑經典的性格，深化經典內容的探討（如探討書中的微言大義），塑造經典的神聖化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如視先秦部分思想家的著作為經典，早在戰國時期，《韓非子》一書就有《解老》、《喻老》。《呂氏春秋》和漢代的《淮南

子》，東漢的高誘也有精闢的注解。如就史書來說，《國語》有韋昭注，《戰國策》有高誘注，《史記》有三家注，《漢書》有顏師古注。如就當時的文學作品來說，《楚辭》有王逸的《楚辭章句》。這些都是現存保留較早的古注。他們的注和當時的注經有何異同？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詮釋經典的著作，有所謂序、傳、說、記、注等。前代學者研究《周易》時，將經傳合併討論；研究《詩經》時，太重視《詩序》，而忽視《詩經》詩篇的本來意義。研究《春秋》和《三傳》時，又往往太重視傳而忽視經，甚或以傳改經。研究《儀禮》和《禮記》時，不能將作為經的《儀禮》與作為傳、記的《禮記》對照通讀。這些都是經傳詮釋不能密切配合的例子。本計畫將對經、傳的詮釋關係，作深入的探究，彌補前人在此方面的不足。

### 三、經典反映的文化面相

經典本來是當時人們文化活動的部分記錄，歷史飛逝，當時的文化情境無法重現，要了解當時文化的面相，就必須靠留存的書面文獻，或各種文物資料。由於各種經典僅能是當時文化面相的部分記錄。所以，要能比較精準的呈現當時文化的面相，必須將各種經典反映的各類文化資料作詳細的考辨，和出土文獻、文物互相補足，試圖重現當時的文化面貌。

如就傳統經典來說，《周易》本是占筮之書，除反映當時占筮的實況外，占筮用的卦爻辭，反映了當時哲學、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語言、藝術等狀況。《尚書》是當時公文書和相關文獻的彙編，反映了當時政治思想、歷史事實和文章寫作的技巧。《詩

經》是樂歌總集，其中有科學、政治、戰爭、祭祀、社會風俗、美學等方面的材料。《周禮》是周代理想政治制度的反映。《儀禮》紀錄士大夫所應遵循的禮儀規範，包含古代婚、冠、喪、祭等方面的材料。《禮記》對部分禮儀規範作深入的解釋。《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既是歷史著作，也反映了政治、社會、經濟等思想的面相。

如將諸子著作也納入研究體系，可以發現有諸多可會通的地方，如《小戴禮記》的〈月令〉，《大戴禮記》的〈夏小正〉，《呂氏春秋》的十二月紀，《淮南子》的〈時則篇〉，內容雖繁簡不一，但都反映了古代時令與施政的關係。《逸周書》有〈官人篇〉，《大戴禮記》也有〈官人篇〉。《荀子》有〈勸學篇〉，《大戴禮記》也有〈勸學篇〉，都可一起來研究。又如《荀子》中論禮的諸多文字，與《大、小戴禮記》也有不少相重複的地方，可以反映當時禮學思想的發達。

前人由於受當時圖書分類的影響，經、史、子、集的壁壘分明，且太重視經部，而輕視子、集部。因此，研究經的學者，不涉其他三部。今人研究史、子、集部者，又不太探究經書。以致不能將古代留下的典籍視為一文化的整體，大部分學者都侷限於自己的研究領域來看待古代文化。本計畫視大部分文獻資料為經典，作整體性的探究，希望能以經典作為切入點，探討經典與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關係。

為推動國內外對中國經典學的研究，「經典與文化的形成」研究計畫的先期規畫計畫，每月策劃至少一次讀書會，聘請國內外相關研究專家進行導讀，鼓勵國內文史科系研究生參與，培養此一研

究主題相關的研究人才。此一先期規畫計畫自 2003 年 7 月 1 日開始執行，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結束，總計進行了將近三十場讀書會及專題演講。期在密集而有質量的研討過程中，利用新材料、新方法來建立新的學術觀點，並作為強化古代史研究的基礎。

此外，為了讓國內中文學界的經典研究者，能了解國外研究中國經典的狀況，我們選擇較有代表性的論文，邀請精通外文的青年學者譯為中文，這兩年多完成的有將近十篇。為了讓更多的學者有更多參與的機會，也舉辦了有關經典注釋的座談會。為了讓這兩年半的學術活動留下忠實的紀錄，我們從三十場讀書會及專題演講中選出論文九篇，編為「論述篇」；將近十篇譯文中精選六篇，編為「翻譯篇」；又將「中外學者論經典詮釋問題」的座談會紀錄整理出來；並附錄「經典與文化的形成」研究計畫讀書會學術活動一覽表。本先期規畫計畫雖已結束，但 2006 年 1 月 1 日起為期三年的「儒家經典之形成」則接著登場，將來執行成果也將陸續出書，為強調兩者間的延續性，將本書定名為《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一冊，希望第二、三冊，會緊接著出版。

本先期規畫計畫承李遠哲院長、朱敬一副院長、劉翠溶副院長、許倬雲院士、黃寬重所長、王汎森所長之大力支持，特誌謝忱。

2007 年 7 月

林慶彰 誌於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501 室

#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

## 目 次

序 言 ..... 林慶彰 I

### 論述篇

#### 〔總論〕

- 古今文獻與史家之喜新守舊 ..... 顧史考 1  
古文字資料對先秦古籍的補正舉例 ..... 魏慈德 29  
古義與新疏——從新疏薈萃清代經學之成果談起 ..... 張素卿 59

#### 〔周易〕

- 從乾坤之德論「一致而百慮」 ..... 鄭吉雄 87

#### 〔詩經〕

- 「《詩經》的形成與流傳」研究初探 ..... 楊晉龍 121  
上博藏簡整理與孔門詩教 ..... 姜廣輝 191  
詩六義原始 ..... 王小盾 227

## 〔春秋〕

- 經典的傳播與歧異——以《春秋》經傳為中心……………趙生群 351  
「《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王基倫 375

## 翻譯篇

### 原始儒家思想與經學：經學之本質

……………〔日〕重澤俊郎著·金培懿譯 415

### 經書觀形成過程之一考察（序說）

……………〔日〕關口 順著·王 迪譯 491

中國思想的訓詁疏註……………〔日〕根本 誠著·王 迪譯 519

### 夏含夷《孔子之前：中國經典形成研究》一書的五篇書評

……………〔美〕戴思客等著·胡元玲譯 537

### 孔子教導弟子攻乎異端？——《論語》2.16 各家解讀之摘記

……………〔英〕傅 熊著·胡元玲譯 561

### 「其經文與今本亦多有異同」——皇侃《論語義疏》

四庫全書本之個案研究……………〔英〕傅 熊著·胡元玲譯 595

## 座談紀錄

### 中外學者論中國經典詮釋問題

#### 第一場：漢學傳注在中國解經傳統中的地位問題

……………何淑蘋、廖家君整理 621

第二場：西方學者論中國經典詮釋問題……………林素芬整理 667

第三場：宋學傳注在中國解經傳統中的地位問題… 沈明謙整理 705

## 附 錄

「經典與文化的形成」研究計畫讀書會學術活動一覽·····	757
------------------------------	-----

## 論述篇

# 古今文獻與史家之喜新守舊\*

顧史考\*\*

### 一、前言

《論語·八佾》載孔子（551—479B.C.）之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古今文獻學者所推以為宗之名言。誠然，欲徵求乎前代之典章制度，圖借鏡於古人之歷史經驗，固非以其文獻為途徑不可。然古代文獻之不足徵者多矣，而其所以不足之

---

\* 本文的研究與寫作得到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臺灣項目）及臺灣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的資助，在茲特致謝意。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上海舉行的「中國上古史：歷史編纂學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上海博物館及《歷史研究》編輯部共同舉辦），2004年1月8日。在本次中國文哲研究所發表後，又發表於2004年3月大阪大學文學院舉辦的「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戦国楚簡と中国思想史研究」；收入大阪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編輯：《中国研究集刊：特集号「戦国楚簡と中国思想史研究」》（第三十六号），頁57—74。

\*\* 顧史考，美國郡禮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人。

\*\*\* 編案：本書【論述篇】作者之單位職級，以發表時所登載為主。

故亦非一端。或以古籍既缺，而指津者亦寡；或以古文難曉，而今字乃乖戾；或以師徒相承，增益不休，而時序先後相混；或以歷代相傳，抄錯遺漏，而篇章不成文義。要之，今日所面對之傳世文獻，已遠非昔日所目睹之原作，而今人對古文之體會與理解，亦無法與古者相比。然而通過嚴謹的文字、音韻及訓詁等學門，再加以文本的校勘與句法的分析，庶幾古人之言與先聖之制尚可考徵其一二焉。

然我們當今研究上古文獻比起歷代學者顯然具有兩種條件讓我們能夠佔到某種優勢。其一是我們可以利用歷代前賢已有之成果，其二則是我們正處於考古發掘的簡帛文獻大量出土之際。自從王國維（1877—1927）提出所謂「二重證據法」以來，即「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研究中國歷史之學者乃特別重視出土資料。基於王氏之認識，如李學勤（1933—）、裘錫圭（1935—）等當代名儒亦經常指出今日所出的簡帛古抄本之發掘正如過去孔壁中書、汲冢竹書的發現一樣，而我們當前對之所進行的整理工作亦好比西漢、西晉時儒者用此古文資料來與傳世的今文文獻相互校讎那樣。<sup>①</sup>眾

---

① 見裘錫圭：〈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1980年5月著），收入氏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頁1；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1994年11月編寫；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頁3。夏含夷指出，經過考古發掘而得的、與傳世文獻相應的古本，其最可貴之處並不在於其可借以糾正傳世本錯誤的「直接證據」本身，而在於其對於我們瞭解古人著書與傳書的過程所提供的「間接證據」與訊息；此堪稱中肯之論。見 Edward L. Shaughnessy,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年)，第一章。本文多受此三位學者在此方面之論著的啟發。

所周知，西漢惠帝四年（西元前 191 年）「除挾書之律」而「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之後，當時通行文字已與秦以前的六國文字有所隔絕，且因「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之局面，而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sup>②</sup>到了孔壁書發現時，古文字學已為一種專門學問，用六國文字寫的古書必須加以隸定才可為一般學者所能讀，故《史記·儒林列傳》形容孔安國之整理孔宅《尚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sup>③</sup>《漢書·藝文志》形容稍後（宣帝時）的京兆尹張敞之古文特長則曰：「《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sup>④</sup>此皆足以說明西漢時人讀古文字已相當困難（更何況西晉時）。<sup>⑤</sup>再及成帝河平

- 
- ② 見《漢書·藝文志》所敘及《漢書·楚元王傳》所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701、1968。
- ③ 《史記·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漢〕司馬遷撰，顧頡剛等標點：《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3125。參看王葆玟：〈今古文經學之爭及其意義〉，收入《中國哲學》編輯部編（姜廣輝主編），《經學今詮初編》（《中國哲學第二十二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300—301。
- ④ 《漢書·藝文志》，同注②，頁 1721；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1958 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 11 月三版），頁 8。
- ⑤ 《晉書·束皙傳》謂汲冢書之初況及其整理曰：「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列傳第二十一）。〔唐〕房玄齡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1433。

三年（西元前 26 年）「求遺書於天下」後<sup>⑥</sup>，劉向（77-6B.C.）校中秘內外古今文書，而「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或「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sup>⑦</sup>，此劉氏所見古今書間之假借及形近誤字的狀況，正如我們今日所看到的一樣。然則前人對於先秦書籍的整理事業確實有得與我們今人對出土文獻之工作相比。

然則我們當今面對新出土的古本資料而以之進行對傳世今本的校讎整理時，應該採用何種的處理方式，該以何種標準而定兩者之間的善惡是非？此問題即涉及一種雙面性的複雜事實。一方面，傳世本皆或多或少早已經歷了一種整理過程，再加上後代傳抄者的誤抄與「妄改」，而當今的傳世本中所存在的問題堪稱比比皆是，確實值得與出土本相對校讎。然另一方面，我們今日整理出土文獻的能力與基本條件不見得要比過去的人好，而我們亦必須經歷與他們相同的整理過程，遇到相同的困難，因而為了避免種種誤解，亦非將傳世本拿來與出土本相互校勘不可，如此才能確切地瞭解出土文獻中的「肖」、「立」、「芳」、「長」究竟應該如何釋讀。本文擬針對古今兩本間差異性的處理此一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希望藉此考慮如何避免某些至今仍然見到的學術偏見與障礙。

---

⑥ 《漢書·成帝紀》：《漢書》，同注②，頁 310。

⑦ 分見劉向〈戰國策書錄〉及〈晏子書錄〉佚文；〔清〕嚴可均輯，任雲芳審訂：《全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10 月），頁 379、382。可參余嘉錫撰：《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7 月），頁 99-101。